

May 2016

The Cultural Nature of Material Objects and the Return Route of Material Culture

Liang Xu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Recommended Citation

Xu, Liang. 2016. "The Cultural Nature of Material Objects and the Return Route of Material Culture."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36, (3): pp.136-141.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36/iss3/13>

This Research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物的文化性与物质文化的归路

徐 亮

摘 要:“物”是一个符号,存在于人类的意义区分和表达系统中,所以它是一种文化观念。消费社会的物具有体系性,由文化观念主导,带有人方向感。由于展望是消费社会人与物的关系方式,也由于物质文化的落脚点在物,消费社会的物质文化的发展表现为永无止境的对物的追逐。这项设计基于物的实在性却回避了死亡,其基点极不可靠且引发面对死亡时的无助感。符号的转义运作是多向的,必须选择好的而不仅仅是真的方向。仅止于物的设计文化肯定不能把我们带向好的去处。

关键词: 物质文化; 物体系; 消费社会; 好的

作者简介: 徐亮,西方哲学博士,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文艺学专业,主要研究领域为现当代西方文论,后理论。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后理论’的文学转向及其意义研究”[项目编号:15BZW003]。电子邮箱:zjdxuliang@163.com

Title: The Cultural Nature of Material Objects and the Return Route of Material Culture

Abstract: Material object is a sign which exists in the system of meaning discrimination and expression, and it is a concept in culture. Material objects in consumer society show the features of a system that is dominated by cultural ideas with the human sense of orientation. The development of material culture in consumer society necessitates the insatiable pursuit of material objects, because the prospect of material objects comprises the man-material relationship in consumer society and the foothold of consumer society falls on material. As the pursuit is based on the substantiality of material and it tries to avoid the certainty of death, the foundation is unstable and the result is the sense of helplessness in face of death. Transformative operations of signs can lead to different orientations of meaning, and the orientation should be chosen on the basis of good instead of truth. The cultural project that rests on material will not lead us to the orientation of good.

Keywords: material culture; system of objects; consumer society; good

Author: Xu Liang, Ph. D., is a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China), with research focus on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Western literary theory, and post theories. Email: zjdxuliang@163.com

一、作为文化观念的“物”

中文“物”这个词至少有三个所指:物质(material),对象物(object),事物(thing)。第一个所指“物质(material)”指构成可见可触摸的万物的材料,突出实在性、可触可感性,但也让我们关注它的构成成分。也就是说,感官(及其延伸

物)无法触及的就不是物质(material),比如精神、计划、消费。“对象物(object)”虽然也指实在的实体,物质性也是它的外延,但它强调的是主客二分模式中的客体性,它标志的是“不是主体”;当它意指可感性时,也是在强调感知客体的方面。第三个所指“事物(thing)”的外延就要宽泛得多了,它不仅指实体性的可感物,也指非实体性的对象,只要是能被思考和认知的都是事物(thing)。比如康德的物自体(thing-in-itself),它

可以被思想,但不能被感觉。

这三个所指显示出,必须有区别地对之加以使用,也许中文的“物”必须被分解成三个词,就像上面所做的那样。它们代表不同的意思。因此,物不是物,不是实体,而是符号;物质(material),对象物(object),事物(thing)也都是符号。说它们是符号,还不是说它们以一个特定的语音或文字代表一个特定的所指物(thing),不是指与事物相对应的一种记号,而是说它们的存在是为了与不是它们的意思相区别,它们是为了区别不同的意思而被生产和使用的记号。“物”被区分为三,借以辨别出特定的意义;而物本身,即使不再区分,一旦被指及,又何尝不是执行着与“心”“人”等等相区别的表意符号功能呢?除了这个,它是没有用的。人类的语言是如此有趣又如此纠结,它永远不会被限制在对象物身上,它要通过对象物的谈论展示对它们的谋划。而一个在使用中生产意义差别的符号系统,正好与这种谋划、愿景的展示相适应。当我们说到“物质文化”的时候,不是在说一种由物的排列构成的对象世界,而是在说一种与精神文明有别的样态,在其中每一个原先被理解为对象物的东西都被人的整体性谋划所介入和逮住,或者扭曲。

符号表示出差别,差别标志着分类,分类致力于筹划,而在筹划中,价值标准就显现了出来。所以,物的符号性也就是它的文化性,它表明,它就在人类的意义区分和表达系统之中,本身赋有文化的身份。它是人的文化观念中的一个表现性要素。所有看起来指物的词都充满文化,都反映出筹划及支撑这种筹划的价值标准。它们本身并非有一个摆脱了意义填充的对应物。它们表征的是任何虚构的“物本身”或“纯粹物”都不具有的品性。“屌丝”跟人的物理构成或生物性质没有任何关系,它只在一个分类系统(按财富拥有量和社会中被关注程度区分的人的等级)中有意义,它只是一个意义;即使“玫瑰花”这样似乎很实在的词语,也并不是一物,而是一个类别,是与所有不是玫瑰花的花相区别的一个类。

区别是语言符号活动中一个无法遏制的冲动,它把文化牢牢地与自己捆绑在一起。因此,“物”以及与之相关的符号群归根结底是文化的要素本身。

除了区别,符号的运作也植根于另一个无法

遏制的冲动——转义的冲动中,这推动了对物质文化的生产。对“物”的区分划出了界限,它让我们在一个空间中通过比较品味其不同区位的差异,就像上文把“物”分为三种,每一“物”呈现它与周边“物”的不同;而且这种区分是可以继续的。符号的转义生产是一种时间轴上的冲动,这种冲动就是要在符号运作中产生新义。“有话要说”意味着说不同的话,但是你必须原有的话题或与之类似的话题上说。这些话题本身是不安分的,跃跃欲试地欲摆脱原有轨迹到一个新的地方去。而且在去到之前,说话者并不知道那地方会怎么样,他与受话者一起准备承受转义带来的所有后果。说这是一种冲动就是因为它的不安分守己,不甘于恒定,符号的运作就是冲着新义来的。“物”在与周边词语的接洽和伸展中变得不再熟悉,不再是人们以前认识的“物”了。它被各种互适互动及延展弄得面目全非。但循着其转义路线,或者甚至仅凭“物”这个词或词素执着不停的再现,人们却仍旧能听见“物”的基调。转义中的“物”既不是又是“物”,它是新的,却同时是“物”的题中应有之义。转义运作创造了新义,把它创造得犹如它原来应有之义,而且这种新义被屡屡加入该词、该符号的本义。你可以说这种转义创造了新义,你也可以说这种转义“发现”了本来并不存在的“本义”。这种时间轴上的延展也是“物”的筹划方式,因为它与不同的词语符号的纠结打开了它新的境界。当今,人们在“物”上通过时间轴的这种差异性的谋划创造着令人目不暇接的物质文化。

二、物的系统性和物质文化的未决性

作为文化的物并不能单个存在,它们被指及的时候都牵涉到物的系统。任何物都是一个或几个不同的物系统中的要件。“信用卡”这个“物”牵连出银行信用系统,个人信用水平,一定的财产拥有量,支付方式等一系列相关的物概念,它与我们当下这个消费社会相互维系,互为前提。物的系统性是由文化观念主导的,它带有人方向感,维系物的体系从根本上是人对当下的理解和对未来的筹划。

鲍德里亚的《物体系》里提到两个不同的物体系:象征体系和功能体系。物在象征体系里与

人具有深切的关联度,人通过使用和每天上手与其建立了亲密关系,物收藏着人的生活记忆,象征人的生命和存在,人对其拥有临在感。在这个体系里有一些典型之物,比如家居生活中的镜子,全家福画像或照片等;这些物件的摆设通常是有定式的,都是围绕着主体建立起来的秩序,因此,它们通常会存在于一个空间内,这个空间是封闭的。从总体看,它们代表着二十世纪以前的一种文化,一种规划和处置物的方法。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功能化的物体系,这个体系中所有物都以抽象的功能性被标签,其中每一个物都被看作总体功能性的一个要素,这个物的体系本身也是一个功能体系。这个体系指向哪里?消费。取代凸显主体筹划的系统的是凸显消费功能的系统。功能体系把物镶嵌在消费为主导的庞大计划蓝图中,它们各各担当的是“消费”这样一种合法的梦想中的拼图部件。因此,这样一种物的空间是开放的,没有专属性,它们不需要与人的具体日常生活发生联系,没有临在感,只是可以用于任何消费构想的部件。镜子在现代家居中仍然存在,但它们不再用于自我外貌的繁衍增殖和玩赏家产的自恋,而是洗手间中执行特定功能的部件。“现代居所”这个大的构想由其中的各个细节调配而成,你必须注意大到景观、社区,小到浴室挂件的所有因素,被消费的是功能性整体。

消费社会中物的功能系统性使得物的消费本身反而虚化了。蓝图中需要镜子并不意味着主人有必要利用镜子的使用价值;拥有高尔夫俱乐部的会员卡也不一定意味着主人一定对高尔夫球感兴趣,也许,它会促迫主人把“高尔夫球有趣”的概念植入自己的意识,但更主要的恐怕是主人在消费它象征的地位和生活方式;旅行社在浑然一体的自然景观中找出各个景点,筹划行程,而旅客到此点一游,竟然会认为已经旅游过该处了;如此等等。消费社会中人们消费的并不是物,不是物的使用价值,“被消费的只是理念”(布希亚 226)。

在消费这样一个前景引导下,物被用作“朝物体系”筹划的道具:小资情调的物体系,土豪的物体系,腐女的物体系,如此等等。这些体系为各种消费物安排了结构位置,相同物在不同体系中执行完全不同的功能。它们是被体系筹划进来的。任何物,其意义在于它被置于一个什么样的生活愿景中,作为一种什么样的整体设计中的拼

图。消费者与物的关系是展望性的:四环以内的一套公寓,学区房,顺着这个换喻关系可以推进到周围的购物环境,停车位,居民成分,绿化,景观,乃至在花香鸟语中推着童车漫步的前景。由于在展望中,那些尚未就位之物就成为要获得(购买)之物。消费者拥有一个物品,犹如拥有一种梦想,一种品位,它既表现了设想,也表现了持有者拥有梦想这件事本身:他/她不是芸芸众生。此前的物质文化中,物在被使用后才拥有文化价值:它被作为一种用具买来或交换来,但是在使用中,通过每天接触,人与之产生一种亲密关系,人的处境和情感被刻写上去,使之成为承载主体印记的文物,例如海德格尔分析的梵高画作中的农鞋。此时物的文化性带有浓重的怀旧色彩,它是朝后看的。与那种文化相适应的是一种节约的经济学,因为人们不需要通过物的持续置换来满足创新或设计的欲望,而需要维持和培养与物品的持久关系。在这种情况下,节约无疑是一种美德。反之,在消费社会中,消费的经济学倾向于不断置换乃至浪费,一次性取代了经久耐用,消费是经济的动力。在不断的置换中,人与物的持久关系根本无法保持,而对物及其系统的筹划的冲动却无法遏制。

展望是消费社会人与物的关系方式。所以,消费社会的物质文化一直处于未决状态。毋宁说,消费社会令物和物的体系始终处在可塑阶段,有待完成但永远不会完成。它本身包含一个巨大的诱惑,推动人们不停地对物及其系统加以设计、设想,然后,未等它成型就加以抛弃,留出继续设计的空间。尽管功能性取代了临在性,成为这种物质文化的显著标志,但是,为了创新,为了疯狂的想出又疯狂的替代,整体的功能性有时会退后,前一个设计的系统性未得实现和提高,就粗暴地拿出一个新的方案,或者一个创新物,围绕着后者可望组织起一个新的系统。这可能就是整体的功能性虽然是消费社会物质文化的特点,却从未实现的原因之一。

三、恋物崇拜的怪圈

我们现在面临一个矛盾境地。一方面,物的文化性使得对物的各种设计和布置,乃至渴望,都蒙了文化之名,它是一种梦想,一种美学理想;另

一方面,这种梦想是由物及其配置加以代表的,因此,进步和发展落实在物及其体系的翻新上。如果物质文化的发展永无止境,历史将表现为对层出不穷、花样翻新的物的追逐。

这有点像马克思在“商品拜物教”概念中揭示的情形。劳动产品一旦进入社会,就具有了交换价值,这样它就成了任何物品的等价物,摆脱了单一使用价值的限制,从此成为一个不同的物品,仿佛拥有了魔力。人们会把它当作魔力之物加以崇拜。马克思指出这是一种认知上的错误,因为真正使得它具有交换价值的不是表面上看起来的使用价值,而是其中凝聚的一定量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马克思的论证使我们注意到了这样的现象,就是存在着把有价值的东西落实到物的思路。把商品神秘化并当作崇拜物的想法,最终把一种抽象的神秘性落实到物身上,对物加以崇拜;同样,消费社会的理想和激情最终也落实到了物身上。

事实上,把理想落实到物是一种最常见的思路,它会使我们觉得比较踏实,尽管它实际上并不可靠;它反映的是一种除了物便无处可靠的认识形态。消费社会对物的追逐,其合法性基础是由人道主义提供的。人道主义否定了柏拉图的理念论,把人的实在论建立在感官感觉及与之对应的清晰理性上,追逐更好的物质文化成为解放了的人的合法事业,系统性的想法把这项事业推到极其繁忙的程度。人道主义所释放出来的现代性则使物质文化的进步变得永无止境,它的最新版本就是消费社会。

鲍德里亚对消费社会作了严厉批判,除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路数的批判外,他还深刻揭露了消费社会在人与物关系上制造的异化与不和谐:人们消费的是观念而不是物,它不是由需要引发的,这些物只是作为记号和功能存在着,它们之间已有的差异荡然无存,而人与物的亲切关系则遭到了破坏。鲍德里亚厌恶物的功能性体系,他称这种体系基础上的消费“是一种完全唯心的作为”(布希亚 227)。也许,在他对之怀有好感的象征体系中,人与物建立了一种唯物的关系:“在那个世界中,灵魂的扰动与事物的临在,有着‘自然’的谐音关系:一种内化的氛围”(布希亚 22)。在《消费社会》中,他通过援引一部影片《布拉格的大学生》,具体描述了这种自然的谐音关系:“我们的行动在我们的周围构成了一个属于

我们影像的世界。个体与其镜中映像的不变关系较好地表现了我们与世界关系的透明度:这种映像的忠实,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了世界与我们之间的一种真实的交互性”(波德里亚 221)。接下来他说,假如我们缺失了这种与物互动构造出来的映像,我们就被异化了。也就是说,我们周围的上手之物是自我存在的实在性证明,消费社会把这些物从人身边赶走,又使物成为唯心的计划的记号,不再与人的生命发生联系,把生命推向虚无。

这是一个吊诡的论证。一方面,鲍德里亚抨击消费社会的物体系使物失去了与人的亲密(临在)关系,他痛惜的是在这样一种剥离过程中,情感、记忆这些属人的价值在物上的丧失。在这种论证中,物是对象,产品,它发挥使用价值的功能,由于人的临在,它成为情感和意义的象征,这种精神的价值成为消费社会物体系的牺牲品;但是另一方面,一只无形的手把鲍德里亚又拉回到唯物主义立场:他希望这些情感、记忆具有物的归属感,它们不能偏离与物的交互关系,而在这里,物不是对象,却成了主体性的身体/物。在《布拉格的大学生》中,主人公为了金子出卖了本应追随自己左右的他的镜中影像,遭致最后悲剧性的结局。鲍德里亚认为这个悲剧是因价值和意义脱离了身体所致。按鲍德里亚的谱系,镜像象征人的行动的意义,那这个意义所脱离的唯物的基础就应该是人的身体。按照这个逻辑,随着镜像的被沽售,意义就失去了承载它的物质基础。然而鲍德里亚又认为,承受这种异化的苦难的就是这个肉体:主人公被镜像折磨,试图控制它而不得,最后开枪射击镜像,而中弹倒下的却是身体自己。看起来,这人/物是一个带有眼睛和情感并能够进行判断的主体性身体/物。我们在这里遇到了逻辑上的矛盾,以及对主体性身体/物概念的困惑。

然而,重要的倒不是这样的物何以可能,而是鲍德里亚对归属于物的这种唯物主义最终旨归的顽固偏好。正是这种偏好引起了逻辑和概念上的问题。从鲍德里亚把消费看做“唯心的作为”来看,他认为消费社会的问题不是更加拜物,更加崇尚物质至上,而是不够唯物主义,不能把精神的价值落到物的实处,却使劳动者的创造力和情感被当作商品售出,活生生地从人/物身上剥离。

但是,如果把物归还给人,在一个物到处都留有人的情感记忆的诗意空间中,在物消除了它的

筹划性,亦即“唯心的作为”(其实这完全不可能)后,生命就真的落到实处了吗?事实上,象征之物又何尝不是物呢?又何尝不在人道主义的话语之中呢?功能体系中赋有展望性色彩的物,与象征体系中赋有怀旧色彩的物,它们总还都是物,它们都逃不脱拜物教的思路。也许还有别的物体系有待我们去发现?但在这一点上,结果都一样。

四、物质文化的归路

这就到了此节的问题关口:物质文化的归路是什么?通过物质文化我们到哪里去?物真的可靠吗?

物质文化是一个合成品:物体现了文化。人的借口是:我追逐的不是物,而是文化,是诗意或者创造性或者随便什么精神层面的东西。然而,如上所述,它最终落入了拜物教的思路:由于这是文化之物,对这种物的追逐变得顺理成章。在这里,有两层语义系统的运作。它的引申义(文化)看起来像是幌子,它提供了合法性证明;而另一方面,它的本义(物)却提供了人的想象的“坚实”基础,使人在想象中似乎有可以验证的踏实感。

这种踏实感与人的肉体相联系。作为人的生命的最唯物的存在,肉体是我们觉得自己活着的证据。物质文化是与我们的肉体存在相匹配的。平等的分配,舒适的居所、食物、衣饰、化妆品,与肉体(营养、保暖、体面、颜值)组成词语群,是对肉体的慰藉。如果肉体可以永生,那么物质文化设计的基础就是牢靠的,我们可以探讨人与物的层出不穷的新关系并以此永远存在下去。然而,肉体是人生命中最不可靠的东西,毋庸讳言,肉体的末路是朽烂,也就是不存在。肉体的存在是暂时的。物质文化的设计和创新的畅想如果能够激发我们生命的激情,那仅仅是由于我们对于这个基本事实置之不顾:我们把几十年最多上百年的肉体生命当作永恒来过。这种虚伪的态度使我们以为只要物质极大的丰富,并且把公平的分配制度搞定,人们就能从此永远过上幸福的生活。一种使“死”在其整体性建构中缺席的文化无法令人放心,也无法令人信服。有时我们怀疑,对物质文化永无止境的追逐和忙碌,好像就是为了躲避肉体必死的那个终点,或者把对它的考虑无限推迟。

从另一方面看,物只是一个符号。作为符号,

它是趋向意义的,而意义又是向其所有可能性开放的。的确,物可以转向其更细小的局部,或邻近部分,它可以曲尽其妙,但也会走向狭隘局促。这个符号也存在反转的可能性,物转向非物,走出物,在它的反义上运行,或在一个涵盖它的更高的层面上展开它的换喻,它可能会别开生面。

在这方面有一个很好的中国文学的例子:庄子—王羲之—苏轼对物及物我关系话题的关联性写作。

庄子的《齐物论》对物的论述视点很高,他不局促于一事一物,特别是不以物我两分的观点设论,反而在物我之间作直接转换,得出物我齐一,生死两忘的结论,在后世引起了不同的反响。大部分人没有庄子这么潇洒,在生死和物我的反转方面没有悟性,认为庄子的转义特别可疑。著名的王羲之《兰亭集序》(不管其实际的作者为何人,其中的观点广为人知)表达了这种怀疑:“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殤为妄作。”《兰亭集序》立意的基础是对人生短暂和物事恒久之间的张力的感慨:别看我们现在聚会兰亭,相遇于良辰美景,且群贤毕至,吟诗品酒,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其乐无边;然而一旦“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感慨所对之物依然,但发出感慨之人将死,悲伤是必然的;随着死亡的降临,兴感之物与我就是脱离的,而非齐一的,它最终成为后人伤感的由头。庄子的“一死生”并不是因为它不够好而不能安慰这种受伤的情怀,而是因为它“虚妄”,未能落到肉体/物那种踏实之处。这种伤物的情怀在两汉以后成为诗赋随处可见的主题:“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古诗十九首),“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曹操),“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刘禹锡),这里面蕴含的有限之物(人/物)与无限之物(天地自然之物)的对比十分明显;“六朝文物草连空,天淡云闲今古同”(杜牧),虽然直指自然之物,没有人/物出现,但是隐含的出于有限-无限的对比而来的伤感是类似的。

但是就在咏物伤怀似乎要成诗的一种固定模式时,苏轼祭出他的《前赤壁赋》,彻底扭转了这个定势。在这篇沿用主客对话形式的赋体文本中,率先发难的“客”用呜咽的洞箫之音改变了清风明月之夜泛舟赤壁饮酒赏月的欢乐气氛,他感

到悲伤的理由与上述咏物怀古情感定势如出一辙：与赤壁这一自然之物相比，有一世之雄如曹操者，以及他的在人世看来非常了不起的英雄壮举皆如灰飞烟灭，不见踪影，更何况我等渔翁樵夫，“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知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于悲风。”对此，“主”的第一个驳论使用了相对论证：“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物并没有什么可羡慕的，因为从变化的维度来看，任何物（与人一样）都不能有瞬时的驻留；但从不变的维度看，“我”（与物一样）也是永无止尽的。这个驳论以推论的形式证明了庄子物我齐一的思想，但它更像是一种安慰：物与我彼此彼此。而第二个驳论把话题转向了一个不可思议之处：“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食。”因为物各有主，对非我所有的物心生占有之欲就成了非分之想，是无效的。但是，如果我是某物的主，此物是不是就为我所有呢？下文给出了答案：物只有与我们的感官相遇，所生发的东西，即声色，才能是为我所有的，且取之无禁，用之不竭。在这个驳论中，没有感性主体，就没有声色，声色不是物，它要依靠“我”。所以，归根结底，“我”才能为我所有。苏轼对物的演绎走出了对象性的物的符号群，从物走向了对物的主观性的审美，这一出走不仅使现场转悲为喜（“客喜而笑”），而且也打破了诗赋中咏物伤怀的定势。进而言之，它对我们思考物质文化的归路也提供了某些启示。

人的有限性与物的无限性只有在物的物性层面上才会产生所谓的对比，此时人已经被当作了物，这种对比只能反照出人的贬值（渺沧海之一粟）与物的强大（羡长江之无穷）。消费社会把对一个物（消费品）的筹划落实到另一个物——人/物——之上，肉体的改善与消费品的改善一起成为目的。的确，肉体可以加以慰藉，从肌肉、皮肤、毛发及其关联物健身房、护肤霜、发型加以转义。但是肉体意味着会死，这也很实在。今天物质文

化的逻辑似乎把苏轼的“客”所看到的東西也掩盖了。而在这一端，转义仍然是存在的。苏轼以洒脱的“物我彼此彼此”的推论和审美本体化的设想避免了恋物崇拜的绝路，海德格尔以先行到死的假定演义他的存在（本体）论。人可以先行到死，这就是所谓的超越，但是其关联词绝对不是健身房、护肤霜，也不是鲍德里亚的镜子。在物里打转转的符号群被超越了，转向另一些符号。转义的方向是无限的，唯有向物的方向是令人沮丧的，因为它引发了人面对死亡时的无助感，或反衬出人回避死亡的虚伪态度。

人的思想，包括对物的思考，长期以来一直被“真”的价值所统辖，“真”是优先的。其后果之一就是凡事都要落实到可观察、可测量的感性基底，是物的迷恋；其符号学的后果就是强调符号（与事物）的对应性，而忽视符号的转义性。但符号不是为了被捆绑在所指的物上，符号是运作的，符号的运作不是为了回到原点，而是为了超越，它的目标是新的更好的意义。对物的迷恋，我们已经论及，其实并没有落到实处，因为作为符号，它仍然是指涉意义的，只不过它构成的是与质料，比如说身体有关的符号群，它产生的意义最终是令人不快的。也就是说，它也许是真的，但绝对不是好的。这也许是鲍德里亚对消费社会如此愤怒的真正原因。所有批评理论家都看到了这种实践的坏处，这是他们真正诚实之处。他们回应的方式就是：批判。

通过物质文化，我们无法走到一个真正好的去处，这一点应该是确切的。

引用作品 [Works Cited]

波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

[Baudrillard, Jean. *Le Société de consommation*. Trans. Liu Chengfu and Quan Zhigang. Nanjing: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2000.]

尚·布希亚：《物体系》，林志明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1年。

[Baudrillard, Jean. *Le Systeme des Objets*. Trans. Lin Zhiming. Shanghai: Shanghai Century Publishing Group, 2001.]

（责任编辑：王嘉军）